

一、走出中世纪的前夜

1.1 大清帝国素描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的“中世纪”即封建社会显得特别曲折和漫长。从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直到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清帝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备、前后衔接的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虽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发生过数十个朝代、数百位皇帝的风云变迁，形成了世运兴衰不定，王朝更迭交替的社会景观，但是基于牢固紧密的小农业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关系的顽强的再生机能，封建帝国的巨轮总是一再度过危机而存在下来。

然而，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又不是静态的、僵死的秩序，而是一个情节曲折的历史过程。在封建制度的外壳之中，其经济、政治关系和文化形态都经历了一系列损益沿革、起承转合的变迁。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巅峰，同时这个社会的内部也出现了若干历史发展的新趋势。而东方和西方各自发展的历史势头，也在这个时代逐渐接近。这种为当时的人们未及觉察和理解的内部和外部的变动，已然使中华帝国处在了走出中世纪的前夜。为了讲清楚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我们有必要略费笔墨，对这一变动前夜的景况做一些粗线条的描述。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入主中原的满族贵族，是居住在中国东北境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的后裔。公元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完彦部出了一位首领阿骨打（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他被描绘为正直强悍的部族英雄），领导女真人击败辽国，建立大金，在中国古代史上开创了和宋、辽、夏并列的一个王朝。此后蒙古兴起，从1227年至1279年相继灭西夏、金和南宋，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元朝（1271年—1368年）。至明初，女真人分为受明朝管辖的建州、海西和“野人”三部。1583年（万历十一年）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起兵，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内部暨女真各部的长达数十年的征战。这时的建州女真已经开始由采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他们从昂贵的人参、貂皮和珍珠的贸易中获得了统一事业的巨额财源。努尔哈赤创建了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单位——旗。这是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旗来编制的具有行政、军事和生产三大职能的组织。此后由于一些蒙古旗和汉人军队的归附，到1615年“乃析为八”，即在原来的四旗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这就是著名的八旗建制。同年，努尔哈赤和八旗旗主、议政王大臣实行联席议政，形成了氏族社会军事首领的合议制度。贵族军事首领统率的八旗大军，在17世纪至18世纪成为亚洲最强大的部队。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又称后金）。八旗步骑在关外连续向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地方政权发动进攻，夺取了抚顺、沈阳、辽阳等重镇。1625年（明天启五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也就是清朝发祥地的盛京。

奠定了女真统一大业的努尔哈赤在1626年辞世。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后仿照明制，加速了国家政权的封建化过程。皇太极加强了汗（王）权，建立了和王大臣议政制度并存的六部和其他中枢机构，逐渐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身

边，相继拥有一批籍隶辽东地区或自关内归附的文臣武将，像祖辈在北京当过尚书的范文程、被俘归顺的洪承畴，以及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祖大寿（吴三桂的舅父）等战将。这些熟悉中原的政治经验、文化传统和军事战略的汉臣，成为满洲贵族知己知彼并借以联系中原腹地官僚士大夫的中介。皇太极还通过倡扬喇嘛教和军事征伐，统一了漠南蒙古诸部和黑龙江流域，也和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以及西藏的政教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国号“大清”。这是一个刚刚完成了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农奴制度的生气勃勃的政权。

1643年皇太极病故，他的儿子、6岁的福临（顺治帝）在叔父多尔衮等扶持下即位。次年5月末，八旗兵在吴三桂的引导下长驱入关。6月6日（顺治元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此前被李自成农民军占领的北京。

在此后的近40年中，定鼎北京的清王朝进行了统一中国南部的多次征战。这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它包括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的几个小王朝，铲除南明覆灭后进驻闽粤云贵等地的尚可喜、耿精忠（耿仲明孙）和吴三桂等三个军事割据集团（三藩）的一系列军事征战。1683年即平定三藩的两年之后，康熙皇帝从郑成功的后代手里收复了台湾。这一系列征战，最终确立了有清一代的立国根基。

清王朝统一中国的几十年，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和苦难的时代。在华北，满族贵族和八旗开展了大规模的旨在扩大贵族特权地位和解决八旗生计的圈地运动。前后20多年，在广袤的华北地区圈出了总数约在15亿亩~22亿亩的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兵庄田，迫使大批农户破产逃亡。在南征以及在强制推行剃发易服政令的过程中，清兵对坚持抵抗的地区烧杀抢掠。1645年清军攻破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屠城10日，死80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嘉定经前后三次屠城，死2万余人，史称“嘉定三屠”；江

阴破城后死者近 10 万人，仅 53 人幸免；湖南、两广一带，“弥望千里，绝无人烟”^①。为了对付站在南明一边的郑成功从闽南向镇江、南京的北伐，清王朝于 1662 年严行海禁，强行撤离从山东到广州沿海地区的人户，沿海城镇村庄夷为废墟。

牧猎余风和农奴制度，暴力统一和民族隔阂，在清朝开国史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然而，清朝统治者毕竟和起兵于草原汗国的元朝不同。由于在辽沈平原上就形成了“师明之长技以制明”的传统和入关以后对于中原社会政治体制的相当全面的继承，更鉴于各地人民激烈反抗的经验教训，清朝从顺治到乾隆等几代头脑清醒、颇有作为的皇帝，一步步调整了自己的统治体系、社会政策和用人制度。到 18 世纪初，社会秩序业已稳定，汉满矛盾趋于缓和，一个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联合专政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得到了巩固。

有人这样概括过事属巧合的清朝历史：清朝是以小儿兴，又以小儿亡，1643 年摄政王多尔袞扶助 6 岁的福临开创了一朝基业；到 1908 年，福临的第七代孙、摄政王载沣扶持 3 岁的儿子溥仪登基，随之而来的是清帝国的土崩瓦解。为时 268 年的大清帝国，跨越了由中世纪向近代复杂转折的历史。

这个王朝由于自身历史的逻辑，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皇权专制的巅峰。鉴于军事贵族会议制度在开国前后已经同统一集权的君主制度时生扞格，更为了维护一个边疆民族的权贵对于地广人众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清朝开国后的几代皇帝都极度关注从双重政治空间集中权力：一方面，在爱新觉罗皇族宗室内，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争权残杀，康熙果断而带有戏剧性的清除鳌拜集团，雍正严厉打击同“夺嫡事件”有牵连的王公旗主，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到乾隆主政时，满族王公实际上已经无权再参与政务。另一方面，则是清廷对汉族士大夫实施的笼络与高压并举，以及高树君主权威的政策。虽然沿用前朝官僚、重开科举制度、尊重儒学道统等举措体现了清廷争取汉族士大夫和化解民族敌意的长远用心，但满汉畛域心理的长期延续，又构成了前代所无的刺激君主集权的因素。诸如八旗驻防、汉满隔离、部院官职满汉并立、地方督抚多用满人，以及大兴文字狱等等，都反映了满族君主对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反抗可能性的极度敏感和严厉防范。

对于清代君主采取高度集权的上述政策举措，许多书里都有过论述，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君主们是怎样从理论意识形态上来阐释他们实行集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虽然清朝皇帝表现了对儒家道统的尊重，并以程朱理学为国家认可的正统学术，但是，他们对儒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士大夫政治和士大夫的使命感，却不屑一顾。雍正皇帝在 1724 年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驳斥北宋欧阳修旨在提倡士大夫集体政治行动的《朋党论》。欧阳修认为，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雍正在他的同名论文里则反复申说，臣子当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即使是标榜忠公体国的结党也决非君子之所应为，而只能被小人们用来营私作弊。雍正在次年将此文和《圣谕广训》一起发给各级学校，令学子们于每月的初一、十五两次熟读。乾隆帝不仅在上谕里常用雍正的遗训来警戒臣工，而且进一步向程朱理学奠基者程颐的一篇论文发难。程颐写过一篇倡扬士大夫政治使命感的文献《论经筵札子》，认为士具有匡正君王、经济天下的使命，可以为帝师，任宰相，身负天下之兴亡。对这一论说，乾隆直斥之为“目无其君”：“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但人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此不可也。”他指出宰

相有忠奸贤庸之别，为君者不能不察；即使是贤相，“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① 这些论说，反映了少数民族的君主对于大权旁落的极度敏感，因而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打击汉族士大夫的传统的政治使命感和剥夺他们的道德自负。

清廷集权于中枢，追求的目标是大臣惟对皇帝负责的垂直体制。这种体制中最能体现“乾纲独揽”的标志，是设立军机处和实行密折奏陈制度。雍正年间，为征讨西北准噶尔部设立了军机处。因事属兵机，该机构的用人不定，随时承接皇帝交办的事务。后来这个机构超越了清初建立的内阁，成为承命于皇帝办理军国要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不和部院大臣及地方将军、督抚来往，直接根据皇帝的意旨办事。密折制度则形成了皇帝和大臣们分别进行单线联系的渠道，中央和地方官员将各种情况写成密折呈送皇帝，皇帝的朱批也以同样方式下达。这样，皇帝既可以直接了解情况，又足以驾驭那些彼此隔离和互相戒备的官僚。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思想敏锐、精明干练，他们的教养、能力和性格强化了这种“圣主”心态，自信能操纵布满全国、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能洞烛一切道德、习俗和学术上的是非。

官僚（行政系统与监察系统）和军队（八旗与汉族兵员组成的绿营），是皇帝统治全国的两大支柱。乾隆时代的 20 万满族八旗有半数卫戍北京，另一半分驻各军事要地。同一时期约 60 万绿营兵遍布于各地哨所。中央行政机构的主要体制是从唐代一直沿袭下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督各级行政官僚的都察院，以及对边疆地区行使治理权的理藩院。在 18 个行省中设立总督和巡抚管辖。省以下依次设立道、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大约 1 500 个县是这一金字塔型的行政网络的基层一

（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载《御制文二集》卷十九。

级。从中枢官员、各省将军督抚直到州官县令都是由皇帝任命的。他们不仅对上司负责，而且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在这个庞大复杂的行政网络中，即使出现某个具体环节的离心或断裂，也不会影响整个权力系统的运行。

全国官僚系统中大约有 2 万名文官，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唐宋开始到明代定型的科举制度，而被选拔出来的。世界上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都需要选拔治理国务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有的产生于贵族等级，有的由武士把持，有的是出自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官吏，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可以说是在古代世界中绝无仅有的选官制度。它以考试来选拔通晓经史和文学的士人群体，作为官僚的主要来源。科举考试有很复杂的程序，产生出从生员、贡生、监生直到举人和进士等各具特定身份的士人，塑造了制度化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和平民的区别不仅在文化程度上，更在于他们的上层（贡生以上包括举人和进士）能和政治结缘，成为进入帝国政治体制的各级官僚；而他们的下层（生员和监生）则活跃在乡土社会，和退休官员（官绅）一起支配基层的行政和教化。据张仲礼教授的《中国绅士》一书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绅士阶层约为 110 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约近 550 万人。^① 这个通常被称为“士绅”或“官绅”的文人群体，在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松散的家族、村镇之间，起着复杂的中介作用，使政权和乡社趋于一体化。

皇帝派到各地的州县官僚（他们主要是经过京师会试取得进士头衔的幸运者），通常要拜会住在他们管辖区内的士绅名宿，没有后者作为统治基础，他们的政令很难贯彻。而士绅们也乐于出入州县衙门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自己的地方声望。官府和士绅相结合的权力，通过保甲、里甲和团练，将行政法令和

张仲礼：《中国绅士》，109～111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皇权国家意识贯彻到广阔的乡里社会。

清代的中国社会、除了少数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塞的城市之外，基本上是以集镇农村为单位的农业社会。虽然在辽阔的国土上，存在着种植方式、民俗习惯和语音系统上的差别，但除了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之外，都具有以小农业经营方式为经济基础，以宗法家族为社会结构核心的共同性。士大夫政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聚族而居的家族一家庭结构，构成了中世纪中华帝国的最主要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受国家土地所有权支配的家户土地占有制。宋明以来，地主私有制和相当广阔的小农私有制对立并存的经济格局趋于成熟和定型。此外还有一部分只有极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大体上讲，在 18 世纪前期，除了皇室、贵族和若干大地主拥有巨额土地外，庶民地主中每户占地百亩或二三百亩者居多，并形成了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封建剥削方式。宋明以降，盛行于两汉魏晋年间的豪家大族对于农奴的超经济强制已经松弛，地主一般只参与产品分配而不直接干预经营过程，从而使农民对地主的身份义务关系逐渐淡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租佃剥削量的减轻，“佃户分种，岁取其半”也就是交纳五成租的情形相当普遍。还有佃户和业主实行四六分、三七分甚至高达二八分成的。^①过度的地租剥削和地主将巨额地租转化为对自耕农的土地兼并，是 18 世纪后半期到 19 世纪的中国农村不断发生农民骚动和武装起义的主要根源。

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经济都是以家户的经营为依托的。“父（族）—子（支）”关系是中国家户或家族的基本结构。一个父家族通常包含由几个儿子所分别组成的支（家户）。这是一个祭祀

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345～36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共同祖先的、由若干分支兼血缘伦序关系联结起来的群体单元。家族的经济纽带是族田和族产，文化标志是族谱及与之相应的宗祠和祖坟。在这样的群体单元里，各家户分别进行着规模不同的物质（农业、手工业）和劳动力（子嗣）的再生产。通常而言，在温情脉脉的家族结构中，存在着多极的阶级和阶层分野。拥有功名身份的士绅或富足的庶民地主具有对家族的支配权，他们通晓祭祀礼仪和具有组织这类活动的实力。他们兴办家学、调解纠纷、举办慈善性的但并无实质意义的赈济事务。他们的说教，包括学校教育、舆论宣传和年节的祭祀、娱乐活动，向族人灌输正统观念和皇权国家意识，并组织族人向国家应差纳税。在社会动乱中，他们往往又是团练的主持者。地主士绅经由宗法家族发挥的这些维护基层秩序的功能，得到清廷法律的认可，而无权无钱的一般族人则处在族权的压制之下。

一族或若干族的人群组成一个村落，在一百多户的村落中通常有一两家小店和若干手艺人。几个或数十个村落围绕着一个集镇，集镇上有坐商、作坊和行贩。村民们的生活资源除了主要向土地索取外，还依赖于用农副产品在集镇上进行市场交换。集镇又通过各种复杂的交换网络和更远的都市发生联系。而一般村民在常态时期不会冒然进城，他们的经济交换、人际来往和联姻关系，大体上不出方圆数十里的十村八乡。

有的研究者对于鸦片战争前夜的清代从业人口构成做过一个匡测：在已达到 4 亿的全国人口中，大约有 90% 左右即 3.5 亿~3.6 亿是农民及其家属。这些人口包括汉族、维吾尔族、部分藏族、生活在南方与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他非农民人口占 10%，即 4 000 万人~5 000 万人。在这个人群（含家属）中，约有 1 000 万人是有功名的官绅和庶民地主（20%），600 万商户、摊贩（12%），300 万~400 万牧民（6%~8%），750 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矿工和船户（15%），500 万灶户（为官府煎

盐的户籍，占 10%），500 万兵弁吏役（10%）。此外还有 1 000 万左右失去正常谋生手段的游民大军（20%）。^①

以上是我们对于清帝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从业人口的一个最粗略的描述。这样一种基本的国情，是我们考察中国步入近代历史脉络的出发点。

1.2 盛世和危机

有清一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迈入衰暮之年。然而，封建社会必然解体的历史规律，在中国是通过王朝更迭、一治一乱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因此这一历史过程就显得分外的迂回曲折、扑朔迷离。如前所述，在辽沈平原上崛起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清王朝。它入主中原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政策，以及开明灵活的边疆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促进了满族文化和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从而自 17 世纪末到临近 18 世纪末的长时段中，缔造了一个四海升平、国力昌盛的康雍乾盛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

康雍乾时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多种形式的疆土开发，对于几千年来连续形成的中国疆域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和行使了有效的主权，使边疆地区由于民族政权和地方势力鼎立而形成的分裂状态逐步走向统一，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趋于制度化。^②

在皇太极时代统一漠南蒙古和黑龙江流域的基础上，漠北蒙

参见郭松义：《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口数的大体匡测》，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523～527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本节关于民族边疆史的写作，主要参考了戴逸：《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载《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党校出版社，1998）和成崇德的博士学位论文《17—19 世纪中叶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等著述。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古（外蒙古）的喀尔喀三个汗部是以和平方式归附清廷的。喀尔喀蒙古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清王朝在定都北京后的第44年，也就是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根据这些草原部族的要求与之会盟，划旗颁律，确立了清廷中枢对于漠北蒙古的管辖权。

清廷对于被称为“卫拉特”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统一要艰苦复杂得多。16世纪—17世纪之交的卫拉特联盟，包括和硕特、准噶尔、土尔启特、杜尔伯特、厄鲁特等部。在清朝入主中原的17世纪中叶，准噶尔部领袖噶尔丹在西北边陲的天山南北地区，按草原汗国模式建立了游牧政权，志在重建辉煌的蒙古帝国而同清帝国争夺中原。在西北地区还有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叶尔羌国，这个民族政权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使它治理下的各族基本上都融入了维吾尔民族之中。属于卫拉特联盟的和硕特部则进入青藏高原，在清朝奠都北京的前两年（1642年），建立了沿续75年之久的蒙藏联合政权。此后准噶尔人又入侵西藏推翻和硕特汗王，在雪域高原制造了巨大的动乱。

面对如此复杂多元的边疆格局，清王朝坚持建立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帝国的目标，采取了刚柔相济、因势利导、循序渐进的边疆政策，为中国的统一大业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明代已经通过对西藏各政教领袖的分封行使了对西藏的管辖权，清朝开国前后进一步加强了和西藏的联系。顺治帝在北京隆重接待了五世达赖喇嘛，并确立了此后历代达赖喇嘛需经中枢册封的制度。康熙朝确立了“班禅额多德尼”的称号和班禅在西藏的政教地位。1718年和1720年（康熙五十七和五十九年），清廷两次派兵远征，驱准保藏，驱逐了在那里烧杀掠夺的准噶尔人，并在拉萨长期驻军。雍正朝的京师成为翻译刊刻藏传佛教典籍的中心。这位皇帝还把他登基之前的王邸雍亲王府改造成喇嘛

教的京师圣地——雍和宫。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到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清廷隆重推出《钦定西藏章程》共 29 条，铃印颁布。这个章程，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最高法律，最终完善了中枢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英国人对西藏的长期觊觎，被清王朝挫败了。

清朝初期，在收复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台湾岛的事业中出现了两位民族英雄——郑成功和康熙皇帝。1662 年（康熙元年），站在南明一边志在恢复中原的郑成功出奇兵赶走了在台湾实行了 38 年殖民统治的荷兰人。但他的儿子郑经却想“按朝鲜事例”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变成自外于中华的海国。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乘郑经病逝，派军扬帆远征，重创郑军于澎湖，尔后经过谈判，使台湾回归中国版图。

清王朝在统一大业中，和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最为漫长和艰苦。康熙曾三次发兵征讨，大军推进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战略地区。此后清廷和准噶尔部经历了反复的对峙、谈判和战争历程，包括上述驱准保藏，将西南的准部逼回伊犁的艰苦征战。乾隆前期、准噶尔部内讧，乾隆皇帝捕捉住这一征战良机，力排众议，派大军以压倒优势推进天山南北，历经反复苦战，最终铲除了准噶尔割据政权。此后又连续击败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历时 5 年，终于在这个地区确立了新疆的建制，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清朝中枢对于边陲地区，既实施了军府制度和由理藩院垂直派驻官员的行政管理体系，又采取了适应各民族多元文化传统的“因俗而治”的灵活政策。在这些地区立法定章，设官驻兵，筑城戍守，移民屯田。这些举措突破了历代对边疆民族的松散的羁摩（笼络）政策，使边疆的行政管辖趋于制度化。

在民族理论形态上，清代统治者也有适应于统一事业的新创建。春秋、秦汉以来儒学传统中的浓厚的“华夷之辨”意识，经

过清廷几代君主的重新解释，逐渐淡化为含有民族一体内涵的“屏藩”理念。康熙帝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卫戍北方边疆。^①雍正帝的阐释则几乎和“华夷之辨”针锋相对：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之上有苗、荆楚、~~獠~~獠，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②

屏藩理念，虽然同近代的全部领土和国民都一律平等并相互认同的民族国家理念存在着质的区别，但“大一统”的国家框架，中枢和“屏藩”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意识，又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近代的出现，以及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重铸，作了历史的铺垫。

康雍乾三朝是一个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年代。在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耕地面积的扩展，农业生产门类的增加和生产工具、经营技术的改进，人口大幅度的增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大标志。可以说，在 18 世纪，出现了中国小农户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力的历史最高水平。

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是前代所无的。明末耕地面积为 7 亿亩，明末清初的人口在 0.8 亿~1 亿左右（也有的学者估计清代之前人口最多在 7 000 万左右）；到康熙末年，全国耕地达到 8 亿亩，人口增加到 1.6 亿。此后历年人口大幅度增长，到

《承德府志》卷首。

^② 《大义觉迷录》卷一。转引自成崇德：《清朝边疆统一论》，载《清史研究》，1998（2）。

乾隆末年，人口突破 3 亿大关（一说 2.97 亿），这个数据隐藏了本书在后面将要谈到的负面的社会后果，但在当时则是显示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历史上最多能满足 1 亿多人口粮的土地供给，到这个时段已经可以养育为数 3 亿的庞大的社会人群。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代前期的江南地区已经开始大面积地种植双季稻，油料、糖料和棉花等作物也产量大增。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拓展了欧洲的殖民事业，却也使中国农业间接受益。16 世纪以来辗转传到中国的美洲农作物——蕃薯、玉米、花生等改变了中国的农作物结构，延长了全年的收获期，并使得旱地瘠土上也能生长出供人果腹或资以交换的作物，从而从一个方面刺激了人口的繁殖。清王朝各项重农的政策举措，诸如奖励垦荒、减免赋税、治河修堤、赈灾济荒等，促使自耕农们在中原无战乱的年代加强了土地投资，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这种种条件，促成了 18 世纪中国农业经济的鼎盛。

法国学者谢和耐在研究了这段历史之后写道：

雍正时代和乾隆时代前期的中国农民普遍地比路易十五执政期间的法国同行们生活得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居乐业，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一些。^①

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是农产品的大面积商业化。在不少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些农业门类已经出现了不再为自给自足，而是为市场交换而种植的现象。在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在河南和直隶中部，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棉花种植，有的地区，棉田占耕地的 5% 以上甚至 80%~90%。17 世纪末画家焦秉贞的《耕织图》，用数十幅画面表现了从棉花种植到纺纱织布的全过程。徽州胡开文墨庄将这个过程铸成精致的集锦墨锭进贡

^① [法]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文版，417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朝廷。我们今天还能从这套墨模里看出当年的种棉由家庭副业转型为专门行业的盛况。此外，桑、烟、桐油、茶叶、苎麻、甘蔗等为市场生产的经济作物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发展，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活跃。纺织业和矿冶业在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居于首位，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消费和朝廷的财政与军事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基地。制茶、制瓷、采煤、造纸、制盐和其他土特产品行业的分工细密，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和包买商。商业化的趋势，在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北的若干地区形成了一批百业辐辏的都会和城镇。农村集市也在发展并趋于定期化。在繁荣的都会中出现了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商帮。主要从事于金融钱庄业的晋商和经营淮盐、木材、茶叶的徽商鼎盛一时。这些商帮在各都市中纷纷建立行会和会馆，借以互相联络和垄断市场竞争。至嘉庆初年，仅北京一地，“南面正阳、崇文、宣武为前三门，各行大贾，均有会馆云集”^①。这种工商会馆还为进京赶考的士子或在京的中下级官员提供食宿，官商之间借助于乡谊结成了互为支援的保护网络。由于疆土的开发，商人网络迅速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扩展。比如山西的钱庄老板和北京商人进入了东北和蒙古。由于草原上黄教兴盛，寺院众多，寺院自然成了商人的市场和货栈，在边陲和腹地展开了广泛的贸易交流。^② 城镇商业和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税收。乾隆一朝，尽管在边疆开发和大兴土木等方面支出了巨额白银，但国库藏银仍达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转引自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1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参见[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中文版，上卷，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清代早中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之一。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典籍的编纂和刊刻成为国家行为。富有的商人（特别是徽商）也纷纷结纳名士，赞助出版，鼓励后代读书入仕，借以提高地位和介入政治。康熙执政时修纂了《明史》、《全唐诗》，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工具书《佩文韵府》和《康熙字典》等 50 余部官修的或国家资助的巨著。到乾隆朝，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问世。这部汇集古籍 3 400 多种，近 8 万卷的巨著，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① 在民间，涌现出一批被称为乾嘉学派的学术大师。他们在古史考据、史学理论、边疆史地研究和方志编纂等方面成绩斐然。在文学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都是不朽之作。乾隆末叶，四大徽班进京，在中和园（现中和戏院）演出，中国最大的国剧——京剧由此诞生。18 世纪的文化艺术，点缀了清代盛世的文治武功，呈现出群星灿烂、一片繁荣的景象。

然而，如果以后知之明来加以考察，我们应该讲，清代盛世是一个辉煌和黑暗、兴盛和危机复杂交织的时空。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个时代本身的业绩及其统治者对这些业绩的自我陶醉，导致了盛世背后的各种危机迅速表面化。乾隆末叶，中国社会明显地由盛转衰，为后代留下了种种难以释怀的遗憾。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往往周而复始地出现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开朝之初，由于海内空耗，民心不稳，从中枢到各级地方政权一般都比较清明，也比较节俭（据说康熙执政时，36 年的宫中开支，还抵不上明季君主们一年里开销的金额）。此后随着国家的稳定，经济

对该书的分析，可参见黄爱萍：《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的发展，腐败奢靡的风气渐起。到了王朝鼎盛、经济高峰的年代，腐败也就不可遏止地弥漫开来。尔后由于政治衰败、土地兼并、人口压力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王朝的经济由盛转衰，但政治风气和社会时尚却不可能再由奢入廉，反而越演越烈，直到昏天黑地，病入膏肓。清王朝的兴衰，也没有逃脱这种王朝规律的制约。

曾经是 18 世纪生产力发展主要标志之一的人口增长，在同一时期的后半期暴露了它的负面作用。巨大的人口不仅形成了对土地供给的重压，刺激了富户的土地兼并，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政治上的腐败。激增的人口中包括地主士绅阶层的膨胀，他们除了科举考试外缺少其他发展才能的出路。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仕途升迁的阶梯也越来越拥挤，大批自命清高的文人们为谋出路而诉诸不正当手段，投靠权门、送礼行贿、暗通关节、连结裙带等，一时成为士林风尚。而当他们中的幸运者一旦金榜题名，往往迫不及待地凭借特权去索取物质的和心理上的补偿。尽管朝廷高悬廉政惩贪的条律，甚至为了防范官员结党而革禁“私交私宴”，但官员们总有各种巧妙的对策来应付过去。在中国的封建官场中，属于私谊的馈赠和为办事方便的行贿，自掏俸禄的开支和挥霍公款浪费，永远是边际不清的。

乾隆皇帝本人的挥霍无度无疑为官场的奢靡腐化起了示范作用。他是一位热衷到各地巡游显威的君主，毕生巡幸达 150 次之多。^① 北京包括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也是经他扩建或修建的。乾隆的巡游固然有其政治和经济目的；当年的皇家园林也成为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瑰宝，但乾隆的这一切举措，又是同他的财大气粗和喜欢享乐的品格密切关联的。

有的史家认为，乾隆朝出现的和珅集团败坏了政治和社会。

^① 《乾隆帝及其时代》，27 页。